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立法探析

杨彦增

摘要: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非常重视对林木的保护,订立了较多的林木保护习惯法。其内容主要包括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禁止盗窃林木、防火等方面。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在林木保护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探析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的订立情况、内容及其历史作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森林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黔东南;苗族;林木;立法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335(2015)01-0224-04

一、前言

国家林业局 2014 年 2 月 25 日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 21.63%,远低于全球 31% 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7。同时,局部地区毁林开垦问题依然突出。2009 年至 2013 年的 5 年间,违法违规占用林地面积年均超过 200 万亩,其中约一半是有林地。^[1]要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实现我国生态和谐,必须注意吸收一切有用的法治资源,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森林保护法律机制。因而,把少数民族固有的林木保护法文化吸纳进来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非常重视对林木的保护,订立了较多的林木保护习惯法。探析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的订立过程、内容及其历史作用,对加强我国的森林保护以及完善我国当前的森林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的订立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黔东南苗族没有形成过常设的专门社会管理机构,而是由各地非常设的“议榔”、“合款”等组织制定习惯法来进行管理。议榔一般都由榔头主持。榔头向群众宣布榔规,然后由大会通过。有的地方在宣布新榔规之前,榔头要先背诵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规约,然后才讲述本次议榔的内容,以让民众更好地遵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黔东南苗族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丰富的规范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习惯法规范。黔东南苗族的习惯法由于议定组织的名称不同,各地的叫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榔规”、“榔条”,有的叫“团规”、“款条”、“埋岩会议规约”等等。^{[2] (P105)}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习惯法从表现形式来看,既有清朝以来以汉文字记载的法规、碑刻,也有在无文字状态下形成的“埋岩”(无字碑)以及口承流传下来的理词、古歌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黔东南

杨彦增,男,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凯里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立法及纠纷解决文化、民族法学。

南许多苗族习惯法穿上了村规民约的外衣。从内容来看,黔东南苗族习惯法涉及苗族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许多是有关林木保护的。

三、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的内容

黔东南苗族习惯法涉及林木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禁止盗窃林木、防火等方面。

(一) 植树造林

植树造林是保护森林资源及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清至民国时期,苗族民众非常重视植树造林,所种植的树种类也非常多。例如,黔东南从江县的岜沙苗寨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植树造林的好习惯,即人生下来,父母为其种下出生树,孩子长大了要种成人树,孩子结婚时要种婚姻树,葬死者也要栽树。从江县加勉寨的苗族群众很注意种植杉树,每家每年栽20—40株。^{[3](P22)}为了鼓励民众植树,解放以前,黔东南一些苗族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借土养木”的制度。如在黔东南台江县的巫脚交苗寨,族有的宜林荒山,私人可以“借土养木”。即私人可以借族有的荒山植树育林,林木长成后归私人所有。但砍伐以后,老根再生的树秧即归族有。^{[4](P57)}台江县的反排苗寨也有这种制度,即族有的荒山,可以由私人借来养木。私人享有林权,山权仍然归族有。^{[4](P138)}

(二) 禁止乱砍滥伐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民众在重视植树造林的同时,还订立了大量的习惯法对乱砍滥伐林木的行为予以禁止。例如,从江县苗族榔规规定,乱砍杉木的罚八十八斤肉,乱砍别人田地地头休息处挂衣服和饭食的树丫和杉木的罚银八两八钱。榕江县苗族规定,偷砍一株杉木,罚大洋十三元。^{[5](P207)}在从江县的加勉苗寨,寨边的古树禁止砍伐。违者罚一百二十毫,以之买牛或猪、羊,宰杀后分给群众以示警惩。^{[3](P140)}在剑河县必下和久仰两寨,无论族有山林或亲房

山林的树木,都不许随便砍伐,否则要受罚。罚款多少不等,有一、二元大洋的,也有十多元大洋的,有的还要罚杀猪崽吃。^{[3](169)}台江县反排苗族对乱砍滥伐林木也有着严格的规定:“砍去一棵小杉尖,罚银三两三;偷砍柴一挑罚银三两三。”^{[4](P133)}施秉县杨柳塘镇高坡苗寨1936年制定的“榔规条约”规定,在古巴山只能检干柴或砍马桑树和小米树,其它树种不能砍,砍一捆罚大洋5块,若砍伐成材的杉树和柏树则还要重罚。^{[6](P37)}

(三) 禁止盗窃林木

为了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对盗窃他人或者公有林木的行为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处罚。例如,清嘉庆二十五年立于黔东南锦屏县九南乡的碑文规定:“一禁大木如有盗砍者,罚银三两,招谢在外;一禁周围水口树木,一栽之后,不许砍伐枝桠,如有犯者,罚银五钱。”^{[7](P408)}而解放前几十年中,台江县反排苗族处罚林木盗窃的规定是:“私自砍伐林木者,罚银六两六钱。”^{[4](P167)}另外,据《从江县志》记载,民国初期,岜沙村寨老召集全寨男女老少集会,拟定封山条款为:“谁进入封山区偷砍树木,就杀谁家的牛(猪),罚200斤水酒、100斤鱼供全寨人吃一餐。”^{[8](P247)}此条款一直沿用至解放以后。

(四) 防火

火灾对森林资源的危害很大。为了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黔东南苗族制定有一套防火及惩治火灾责任人的习惯法规定。例如,在民国初年,黔东南凯里市舟溪地区的苗族还相当盛行“议榔”,内容多是不准乱放牲畜损坏庄稼、禁止纵火烧山等等。^{[3](P246)}黔东南台江县反排苗族对烧山毁林也有着严格的处罚规定:“失火烧山罚银五两五至十二两。”^{[4](P133)}黔东南从江县苗族榔规也规定:“放火烧山的罚八十八斤肉。”^{[5](P207)}

四、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所起的作用

黔东南地处贵州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质地貌以及气候比较适宜林木生长。

由于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的森林非常茂密。清朝年间,黔东南古树参天,杉、松、柏和种类繁多的阔叶林排山塞谷,遮天蔽日。清乾隆十四年(1749),《黔南识略》记载“郡内自清江(今剑河县)以下至茅坪(属锦屏县)二百里,两岸冀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栋梁栴楠之材,靡不具备。”^{[7](P21)}民国时期,黔东南森林资源为全省之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黔东南境内仍为茫茫林海,有山皆绿。1949年,黔东南森林覆盖率为56%。在全国158个林业重点县中,贵州省有10县,其中黔东南就占了8个,即锦屏、天柱、剑河、台江、榕江、从江、雷山和黎平县。这八个县也是黔东南苗族人口聚集的县,比如,台江县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6.14%,雷山县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84.2%,剑河县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56.16%,从江县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3.12%,锦屏县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1.8%。^[9]由于重视植树造林和注重对林木的保护,解放前黔东南各苗族村寨的村民基本上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以杉树为例,根据土改时的统计,从江县加勉苗寨全寨130户共占有较大的杉木2446株。其中,62户贫农占有1011株,11户雇农占有23株,41户中农占有1012株,4户富农占有123株,4户地主占有224株,小手工业者等8户占有53株。^{[3](P30)}

五、对完善我国当前的森林保护立法的启示

探析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林木保护习惯法的内容及其历史作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森林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固有的林木保护法文化

保护森林资源,构建生态和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协作,也需要国家法律和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少数民族的林木保护习惯法作为少数民族群众林木保护经验的总结,具有自发性和内生性,不仅在历史上起着较大的林

木保护作用,而且当前在群众中仍然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的林木保护法文化有些在理解和认识上有迷信的成分,有些在处罚方面有野蛮和落后的因素,但仍然有许多积极、合理的方面,并在客观上使得森林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因而,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的林木保护法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并注意结合当前世界先进的生态保护理念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这对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森林资源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注意在进行森林保护立法时将少数民族林木保护习惯法中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内容吸收到国家法中,以增强国家法律的科学合理性及实效性。例如,我们可以在国家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村规民约时借鉴黔东南苗族的“借土养木”制度,鼓励全国民众有序地参与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的植树造林。这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也可以增加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

(二) 注意发挥村规民约在当前森林保护中的作用

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基层政权的人手较少以及黔东南苗族村寨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等原因,政府对很多事情仍然是鞭长莫及,案件多由民间自行处理,官府过问较少,国家的法律统治还未能够完全深入偏远的苗族社会中。为了弥补国家法的缺位,黔东南苗族制定了较多的习惯法对村寨社会的生产、生活进行调控,其中就包括制定林木保护习惯法。这些林木保护习惯法在保护森林资源及维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黔东南的苗族村寨几乎都订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中的林木保护款项里面,不仅有国家宪法、森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森林保护方面的规定,还结合本村具体情况,借鉴传统的林木保护习惯法资源,设定了比较细化的规范。例如,1991年1月,黔东南州凯里市平乐乡南花村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25个条

款是林业管理、林业保护方面的。^{[2](P330)}2001年1月,黔东南州雷山县上朗德村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10个条款是专门用来保护林木的。^{[10](P248)}2001年2月,黔东南州雷山县脚猛村制定的村规民约中也规定了多条有关植树造林、保护山林、打击乱砍滥伐的具体条款。^{[11](P197-200)}如此细致、具体的规定是国家法难以做到的,因为国家法要保证其普遍适用性及较高的稳定性,其内容必须具有概括性和原则性。而村规民约往往是各村寨根据国家法律的要求以及各村寨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可以做比较细致的规定,并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具有群众基础广泛、针对性强等特点。在当前国家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规民约可以作为国家法的补充,解决各地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细小问题,以完成对森林资源的更好的保护。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当前森林保护中的作用。当然,村规民约中也存在一些野蛮和落后的因素,有些规定与国家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因而,如何对村规民约中的野蛮和落后因素进行改造,如何解决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这些都是制定现代化村规民约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公布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

[EB/OL].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mtkl/content/2014-02/25/>.

[2]徐晓光.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3]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

[4]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5]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M].香港: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6]余贵忠.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7]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林业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8]从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从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9]黔东南州少数民族简介[EB/OL]. <http://www.qdnrbs.cn/mzls/6282.htm> 2012-6-27.

[10]徐晓光,文新宇.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11]周相卿.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尧水根